

启明文丛

生活和文本中的 社会学



李培林 著



启明文丛



生活和文本中的社会学

李培林
著



C91-53

L22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文丛论/王凯符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656-0908-4

I. ①古…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0027 号

GUJIN WENCONG LUN

古今文丛论

王凯符 著

责任编辑 艾渔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8.75

字 数 445 千

定 价 47.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 录

西学东渐篇 1

西方社会的“官僚病” 3

科学的“思辨”与新的理性 15

法国学院派寨主雷蒙·阿隆 24

关于女性的观念变革 34

未来并非总是美好 43

共和国真义考 53

微型权力专家：福柯 63

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72

整体观时代的到来 82

隐喻的思维魔力 92

法国当代社会学四大流派 102

分立抗衡的两大学派：布迪厄和图海纳 113

走出布迪厄主义的博尔坦斯基 120

经济社会学思潮和罗桑瓦龙 124

新一代学者的崛起 129

风险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风险 133

东方现代化命题 146

小题大做篇 153

路径依赖·知识生产·社会技术 155

大陆新娘·女权·三寸金莲 166

买者定价、社会嵌入及其他 172

台湾村落走访随笔 180

中国大葱与日本电器 192

厕所革命与社会变迁 198

全球化和汽车左行的制度 206

中国视角看日本 210

书里书外篇 223

学术闲书五种 225

参考文献的功能 230

谁在改变生活的逻辑 232

社会流动与中国梦 240

社会公正、黄金分割与和谐社会 243

农民的理性 250

透视“城中村”：我研究“村落终结”的方法 257

书斋随笔 275

调查研究中的故事 288

承前启后篇 295

我的研究理路 297

中国社会学的实践取向与理论匮乏 305

村落终结与中国经验 310

默顿“中层理论”的启示 319

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 322

非正式制度：社会学研究的真问题 328

信任也是一种“社会资本” 331

走向终结的村社共同体 336

劳动关系的社会建构 339

私营企业主的关系运作 344

探寻“关系地权”的逻辑 347

后记 351

西学东渐篇

西方社会的“官僚病”^{*}

概念的规定

按照西方的传统论述方法，立论总要从概念的定义开始。“官僚”二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习惯于形象思维的华夏后裔很快会联想到繁冗的套活、曲折杂多的手续、公文旅行、不负责任的扯皮，甚或家长制、权力终身制、集权、特权，如此等等。但这些只是一般的描述。“官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古而有之，它是伴随国家管理机构的出现而产生的。在西方，国家机构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但是，人类从理论上把“官僚”概念从斑驳陆离的社会现象中抽象出来并加以规定则完全是近代史上的事情。1745年，法国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古尔奈（Vincent de Gournay）首先使用“Bureaucracy”（官僚）一词，这是 Bureau（办公处）和 Cray（权力）的合成词，所以从词源学上说，官僚现象首先象征的是一定的权力统治的组织形式。由于现代分类学的进步和严谨化，“官僚”一词具有多重意义，在使用上不免产生某种混乱。这个词目前至少有三种含义：①指人格上的官僚，代表一个阶级、一个阶层或一个人；②指一种管理体制

^{*} 本文原刊于《留法通讯》1987年第3期。

或组织形式；③指一种工作作风或工作态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官僚主义”。本文主要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官僚”一词，即把官僚病看做社会组织机体的一种病态。

“三维”结构理论的秘密

翻开西方的政治学史，那些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的政治学说都带有三维结构的神秘色彩，给人某种潜在的稳固感。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比较分析了150个希腊城邦，概括出三种政治体制：可以转变成僭主专制的君主政治体制，可以演化成寡头专制的贵族政治体制，可以堕落成惑众专制的温和民主政治体制。亚氏这种三维结构的政治理论和他逻辑上的三段论并非偶然的巧合，这和当时几何学的发达及三角形稳定性的普遍运用有密切联系，人们都想在理论上建树自己的金字塔！此后2000年，孟德斯鸠仍是在亚氏这种三维分类的范围内提出他的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学说，该学说成为法国1791年宪法的理论基础。

三维结构在古代和古典的政治学说中的运用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且还不只是区域性的。连我们的韩非子不是也有法、术、势的三维结构政治学说吗？在西方到黑格尔时，这种理论的三维结构得到最充分的发展。通过一连串的三环一节、节节相扣、环环相连的概念推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从逻辑外化为自然，然后又从自然升华到精神的乐园。在黑格尔的政治学说中，国家是绝对精神进入精神乐园后的最高体现，国家本身有三个层次：最高层是政权，中层是行政管理机构，基层是世俗社会。行政管理机构在黑格尔的逻辑推理中是“国家”从高层政权进入基层世俗

社会的必要中介，所以黑格尔把它称为“国家的精神”。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时把黑格尔所说的行政中介斥为“官僚体制”，说“官僚体制不是国家的精神，而是体现了国家对精神的缺乏”。此后在列宁、托洛茨基、葛兰西、罗莎·卢森堡的批判分析中，都有这样一个过渡：即官僚体制不再被看做只是一个传达指令的行政体系，而是被看做一个决策的政权体系。也就是说，在革命的政治批判学说中，黑格尔的三层国家结构被打破了，政权和行政被合为一层。三维结构从此让位于二元的对垒，官僚体制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走向灭亡的必然病态形式。这种病不是机能的病，而是本质的病。此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官僚体制的批判基本是以此为出发点。

然而，在苏联斯大林时代结束后，问题有了转机。那个把导弹运到古巴恫吓美国山姆大叔的赫鲁晓夫，很有眼力地郑重提出，官僚问题是个行政问题，不是政权问题，这个提法的潜台词很明白，就是说社会主义体制也存在官僚问题，但是判定官僚问题属于行政管理范围，把行政和政权区分开来，这在无意中又回到黑格尔的三维国家结构中去了，即把传达指令的体系和决策体系视作不同的层次。在这一点上，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并不冤枉他，因为他的确修正了一个不大不小但十分关键的问题。至于说这种向三维结构的潜在复归是否受赫氏本人对几何学偏好的影响，那就无从考据了。

理性与情感的互补

从1745年“官僚”一词出现后，这个概念有个逐步完善的过

程。但在西方，这个完善过程主要是在社会学领域进行的，而不是在政治学领域。这也表明，官僚一直被西方视为行政问题，而不是政权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机能病，而不是本质病。“官僚”这个概念的完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 Weber）开始的。这位早已泯世但至今仍在美国理论界十分时髦的实践型理论家曾因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而大出风头。他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写过“现代官僚体制的理想形态”一章，从而使他成为官僚问题理论研究的现代开山鼻祖。“官僚”在韦伯那儿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在他看来，官僚体制是社会组织在历史上的发展结果。它的理想形态体现了理性组织的固有特点，即政权的组织功能受规则和规律的支配。实际上，韦伯把官僚组织看成一种历史的悖论。一方面，官僚组织的产生标志着现代社会中理性的到来，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它撕去了一切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的面纱，把一切非理性的情感都打上价值规律的烙印，凝固于只讲求速度、标准、服从的机械化体制中。官僚体制代替封建体制就像机械工业取代手工业，所以在韦伯看来，工业文明必然是官僚文明。但另一方面，韦伯也意识到，官僚体制蕴含着对人类传统价值的威胁，因为它可能使整个人类都成为国家机器的奴隶。不论是改良家还是革命者，当他试图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时，都难以摆脱这样的困境：一切社会活动只有通过官僚组织才能运行，而决定社会活动合法性的民主原则又是和官僚组织完全不相容的。官僚现象造成的这种悖论至今仍使西方理论界头痛。

在解决韦伯官僚悖论中迈出决定性一步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K. Merton）。默顿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代知识强

人，他虽非什么显赫的名家，却是“官僚”概念发展第二阶段打头阵的人物。他对韦伯“理想的官僚组织形态”提出直接的疑问，导入了“功能障碍”（Dysfunction）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韦伯的理想模式与现实有很大距离，因为官僚体制在实际上造成大量远离理想模式的结果，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官僚组织的臃肿造成了与公众的对立、行为的僵化及对新环境的反应迟钝，从而激化了对控制和管理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组织中的官僚统治。因此，单凭理性的自身要求不可能排除官僚体制的功能障碍。默顿时期对官僚现象的研究深受当时流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影响，表现出情感对理性统治的反动。“功能障碍”从此成为官僚组织的必然症结，实际代表了现实中人的因素对一种组织倾向的抗拒，即把人的行为机械化的倾向，泰罗制就是这种倾向的主要代表。

第三阶段的主角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教授西蒙（H. A. Simon）。他曾获得1978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并担任过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的主席。西蒙在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是有名的杂家，在心理学、企业管理学、哲学、人工智能、组织社会学等方面都可称为大师。西蒙的时代是综合的时代，他的组织理论建筑在理性和情感的综合上。西蒙把官僚组织理论发展的三阶段称为手、心、脑的阶段：韦伯的阶段是手的阶段，因为他的官僚组织理想形态要求的是劳动分工的专门化、个人行为的标准化和生产活动的机械化；默顿的阶段是心的阶段，因为他强调官僚组织的“功能障碍”是由于对人的情感的忽视和对人的心理的压迫；西蒙把自己的阶段称为脑的阶段或新理性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要求手和心、理性和情感的结合。从西蒙的组织理论出发，官僚现象成为一切组织

在其集权化、等级化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官僚组织系统被定义为一种无法排除自身障碍的组织系统，而这种功能障碍病反过来又成为官僚组织系统保持自身稳定平衡、免于崩溃的重要因素。

以上这种理论三阶段的划分大概仍属于理论三维结构的千古之谜，实难概括现实思潮多样性的生动发展过程。

帕金森定律和恶循环

帕金森定律也可叫做“下属递增律”，帕金森（M. Parkinson）曾就公职人员的工作行为发表过一个研究报告，他以幽默的口吻称自己的研究结果为帕金森定律。这个所谓定律可描述如下：在一个机构的一个部门中，开始只有一个职员 A，他直接隶属机构的领导。像日常中碰到的那样，他开始抱怨事务过多、太劳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该部门增加到 7 人，由 A 领导。这下工作该轻松了吧？非也。不仅 A 比以前更劳累，新增的人亦抱怨工作过多，要求在自己的分工方面增添新人。为什么呢？请看这个事实：一天 A 碰到一份要他签署的文件，但他忙得顾不上看一眼就画了圈，因为他满脑子都是要亲自处理的急事：他快提升了，要尽快决定是选择 B 还是 C 来取代他，他还不得不同意 D 去休假，虽然 D 并不是绝对有这种权利，但他的上级向他打过招呼，他还非常恼火地想，难道不应先让身体不佳的 E 去休假吗？E 最近由于家庭忧虑，脸色苍白。另外还有 F 的工资提级问题和 G 的退休报告要处理，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态度，最后，他还听说 D 爱上了一个已婚的打字员，B 和 G 闹意见不说话了，如此等等。A 迫不得已要求增加新的下属，但结果可想而知。一些西方学

者认为中国人喜欢说外国的东西中国古而有之，但这个所谓“帕金森定律”确实类似于我们的“和尚吃水律”：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个定律所揭示的就是官僚组织膨胀的恶性循环。此外从生物社会学上讲，每个部门、每个机构都是活的社会机体，它首先需要一定的能量来保持内在生命力。一个完全处于休息状态的人需要 1600 热卡来保证自身运转，多余的热卡才能用于外部活动。一个组织亦是如此，机构愈庞大，维持自身生存的“热卡”需要的就愈多，碰上官僚体制造成的功能障碍，庞大的机构反而输出的能量更少，自身更接近冬眠状态。

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法国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克罗齐耶（M. Crozier）把官僚现象的恶性循环归纳为一种组织发展规则。在他看来，官僚体制不是一种自组织系统。由于缺乏内部的调节功能，官僚组织必然导致决策的集权化，上下级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分离，以及伴随而来的组织对个人的压力不断增加，个人创造性的丧失等等。这些结果反过来促成官僚组织生长所需的气候和环境，从而使官僚组织加强了自身结构的稳定和守恒，虽是步履维艰，但却长此以往。人们最后面临着一个霍夫斯塔特式的怪圈，分不清哪里是起始，哪里是终点。是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在处理官僚现象上是先解决体制问题？还是先解决功能问题？

卡夫卡的城堡

捷克著名作家卡夫卡写过一本名为《城堡》的小说，风格有些类似以后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厌恶》和荒谬哲学创立者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据西方权威的文学评论家所称，小说的本意

是要描绘“人在面临存在的荒谬时所产生的绝望”。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概是由于社会政治学家们要炫耀他们的文学修养，“卡夫卡的城堡”成了官僚体制的代名词，广为流行。这是一座无法进入的城堡，当你来到门前时，守门人傲慢地接待了你，然后悄然逝去，把你撇在标有“禁止入内”的门前，你费尽力气所能接触到的秘书和总机接线员都禁止你进入甚至接近城堡，但指令不知是从何处发出，也不知指令的对象是谁，整个城堡像个死板的机器。这大概就是人们印象中的官僚机构。人们已习惯于把繁冗拖赘的行政手续幽默地称为“通向卡夫卡城堡的台阶”。有人甚至从卡夫卡的《城堡》里概括出官僚体制的八大特征：一曰无人格集权，这与君主集权不同，君主集权是个人集权，而无人格集权是匿名的，找不到责任承担者；二曰功能障碍，这在企业管理心理学上称为管理病；三曰单向联络，只有自上而下的指令，没有及时的信息反馈；四曰制度僵化，行为机械教条，没有任何弹性；五曰领导无知，不详下情，却死守上智下愚；六曰缺乏适应能力，本能地抵制新环境；七曰烦琐哲学，没有效率；八曰缺乏自组织能力和变革创新精神。

总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官僚体制已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那时它和泰罗制一样，是和生产社会化、操作机械化、技术标准化的概念相联系的，而现在它代表的是烦琐僵化的规章、不负责任的指令、繁缛的行政手续、打太极拳般的工作效率、集权对民主的破坏等等。但正如一些社会学家不无道理地指出的那样，官僚体制造成的恶果并非是它本身的罪过，官僚体制是在企业中心化的自然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本质是行政对企业过多的干预和行政人员本身的滥用职权，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

必然的现象，因为从理论上说没有任何组织形式是绝对理想和完美的。然而，官僚体制作作为现代组织形态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在不同的人群结构中造成的后果大不相同。况且人是任何组织形式的行为主体，而人的行为受整个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克服和消减官僚现象不仅涉及政治体制和组织形式的改革，而且涉及文化传统、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乃至行为习惯的一系列变革。也就是说，要想治好社会官僚病，光靠吃药和开刀动手术不行，要提高整个社会组织机体对官僚病的抗拒力、免疫力。

最佳组织规模

20 世纪 70 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F. Schumacher）写过一本《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 A 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声噪一时。这本书的书名后来成为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口号。该书提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组织的规模问题。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组织的历史是由小到大的历史，先有家庭，后有部落、城邦、国家、联合国，按此逻辑推下去，似乎全世界最后会只有一个政府。生产组织亦是如此，家庭手工业、小公司、大公司、联合公司、垄断公司、跨国公司，整个资本积累过程就是《林家铺子》里描绘的大鱼吃小鱼的过程，而且在一个时期内，组织的规模和人数似乎和繁荣昌盛亦成正比，所谓“人多力量大”就反映了这种观念。舒马赫的贡献在于他发现，无论是何种组织（行政组织、生产组织、教育组织、城市组织）都是小规模的发展得更快，效率更高，一些发展很快的大型组织也是因为内部分成很多小的独立运转单位。正如一个城市的